

***The Profits of Nature: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the Quest for Resourc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y PETER B. LAVEL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288pp.**

Peter B. Lavelle (羅繼磊) 撰寫的 *The Profits of Nature: 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the Quest for Resourc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自然之利：十九世紀中國的拓殖與資源開發》) 以左宗棠的生涯為線索，將19世紀中後期清廷對於西北邊疆地區的移民開發置於全球市場、氣候變化的背景中進行分析，從環境史的角度重新解釋清末的西北邊疆開發。這是近五年來西方學術界有關新疆史研究的又一新著。

全書共分八個章節。在緒論中，作者概要地介紹全書的內容及主要觀點。19世紀，清廷面臨着「完美風暴」造成的帝國危機(William T. Rowe, *China's Last Empire: The Great Qing*,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Press, 2009, 150)，使得朝廷開始轉變統治政策，從傳統的「養民」（通過救濟饑荒和開墾土地來提供糧食，以維持人民的生活）轉向追求「富強」（建立一個以財富和權力為特徵的強大國家），以平息國內的社會動盪，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國際環境中求得生存。與以往將邊疆地區的管理視為中央的財政負擔的觀點不同，此時以左宗棠為代表的一些官員開始重新認識西北邊疆，將這裡廣闊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視為解決清廷困境的出路。隨後的清末西北邊疆開發，使得農業、桑蠶業和採礦業等相關知識和技術由中國東部向西部擴展，將中國的東部和西部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作者指出，與一般觀點認為革新性的西方技術引入是導致19世紀社會變革的觀點不同，本書的研究表明直到19世紀末，農業對於清朝和全球經濟來說依然很重要。邊疆地區的農業開發是人與環境的重新組合，以新的互動方式塑造新的等級空間和領土主義。因此，更應該將這一時期西北邊疆的開發放在19世紀全球「資源型發展的黃金時代」(Edward B. Barbier, *Scarcity and Frontiers: How Economies Have Developed through Natural Resource Exploit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69; Corey Ross, *Ecology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Empire: Europ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opical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中去理解，並充份考慮氣候、水、動植物等環境因素在邊疆開發中的作用。

在第一章「危機時代的農業」中，作者主要探討清末實學和農業實踐對

左宗棠邊疆觀的影響。19世紀初，由於龐大的人口壓力和全球性氣候事件的影響，中國出現「道光蕭條」的社會危機。這促使中國的學者與精英開始放棄空洞的經學，轉而推崇明末興起的「實學」。以岳麓書院為代表的湖南學術氛圍也開始轉向實用之學。這種學術氛圍深刻地影響左宗棠，他開始研習《皇朝經世文編》、《農政全書》等經世書籍。後來，在經營自己的柳莊時，左宗棠體驗茶、桑等農業的種植和商業經營過程，從實踐中體會區田法的意義，並編著《廣區田圖說》、《樸存閣農書》等論著。這些經歷奠定左宗棠認識西北邊疆廣闊土地資源的農業價值的基礎。

第二章題為「不斷豐富的邊疆知識」，主要探討林則徐等人的邊疆觀如何影響左宗棠對於邊疆的認識。林則徐在鴉片戰爭後被貶往新疆，在布彥泰的麾下對新疆土地進行清查，並主持開墾活動，由此形成對新疆資源的認識——邊疆土地遼闊，應該移民實邊。1850年一月左宗棠與路過湖南的林則徐進行深入交流，這對左宗棠產生深遠的影響。於此同時，19世紀中葉的精英對於新疆等邊疆地區的看法也發生改變。過去傳統的觀點認為，邊疆地區是蠻荒之地，中央為統治邊疆而消耗大量的財力。而此時，隨着西北史地研究的興盛，有關邊疆的論著和知識不斷豐富。龔自珍、徐松等西北研究者都認為邊疆擁有大量未開發的資源，可以用來解決當時的社會經濟危機。道光年間的新疆拓殖活動，強化學者對邊疆資源豐富而人口稀少的認識，西北史地研究的學術思想和書籍對左宗棠產生巨大的影響。

第三章題為「開墾土地」，作者討論左宗棠在浙江、甘肅兩地主持的戰後重建政策和具體實施，指出戰爭導致的人口損失、田地荒蕪和動植物復甦的空間差異是區域資源開發的重要影響因素。作者指出，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戰爭和回民戰爭之後各省野生空間的重新興起，標誌着持續兩個世紀的人口增長和農業擴張模式發生重大的轉變。先後任浙江巡撫和陝甘總督的左宗棠通過建立「善後局」，招徠人口向戰爭影響最大的區域遷移，以補充人口，復墾土地。作者進一步補充認為，儘管戰爭緩解人口壓力，但是中原的人口依然稠密，當時的精英仍將目光投向邊疆地區更廣闊的土地資源，以尋找新的發展機會。

第四章題為「經濟作物種植規模的擴大」，討論左宗棠任陝甘總督期間甘肅的「罌粟與棉花之戰」。19世紀中葉，憑藉本省豐富而多樣的農業資源以及成為內地與邊疆地區人口、商品流通的重要通道，甘肅已經深深地融入國內的商業網絡，同時亦受國際市場經濟作物價格波動的影響，成為罌粟種植和棉花種植的爭戰之地。在暴利的驅使下，甘肅的罌粟種植屢禁不止，左

宗棠出任陝甘總督之後在甘肅開展大規模的禁煙運動。與此同時，借着國際棉花價格暴漲的時機，左宗棠大力推廣棉花種植，給農民派發籽種，散發特意編輯的《種棉十要》、《棉書》等技術手冊。作者指出，全球氣候變遷和國際市場的波動決定「罌粟與棉花之戰」的走勢。此外，無論是禁煙活動還是推廣植棉，都使得國家對於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干預達到一個新的水準。

第五章題為「富饒邊疆地區的水」，充份揭示本書的主題「自然之利」的開發。在北京朝廷之上「海防」與「塞防」之爭的核心，不僅關係當時的精英對於領土安全的不同看法，還體現他們對於邊疆自然財富及其發展潛力認識的天壤之別。左宗棠強調外來勢力覬覦的正是新疆豐富的資源，清廷應該重新控制這些地區，並且努力開發資源，才能夠在未來穩固財政的基礎上管理整個地區。收復新疆之後，左宗棠隨即着手開發新疆的自然之利。恢復和擴展耕地的關鍵是土地調查登記、重建和增修水利設施等。作者指出，土地登記、軍人和民眾都被調集來維修水利設施、戰後水權糾紛處理中國家力量的介入等種種跡象都表明，圍繞水資源的開發，清廷對於新疆的管理深入基層社會。1884年，新疆的建省標誌着清朝邊疆政策的轉變，即從以前依靠滿蒙官員聯合當地部族首領進行統治，轉向依靠漢族官員的行省制管理方式。

第六章探討新疆推廣蠶桑技術的過程中，蠶、桑等非人類有機體對於邊疆開發的影響。1840年代後期，由於地中海的蠶桑業受到寄生蟲病的打擊而減產，再加上江南蠶桑業受到戰爭的破壞，導致全球市場上生絲價格高漲。1877年收復新疆的戰役告一段落後，左宗棠注意到俄羅斯的商業擴展會對新疆的安全產生威脅，提出發展新疆的蠶桑業，積極融入國際絲綢經濟市場，以增強清政府在新疆的控制力。左宗棠從浙江湖州引進蠶種和桑苗，僱傭湖州的蠶桑工人來新疆的蠶桑局進行技術推廣。然而技術的推廣卻引起官員與南疆當地居民間的一個根本性的認識分歧：人們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動植物以維持他們的生計？當地的居民有他們自己的一套養蠶技術，但是左宗棠等官員認為當地蠶絲品質問題的根源是該地的桑樹，因此，一方面從湖州引進大葉而少果的桑樹品種，另一方面禁止當地居民採食桑果，以保證桑葉的數量和品質。但是對於當地居民來說，桑果是他們重要的水果和釀酒原料，因此在長期的馴化過程中，選擇和培育多果的桑樹品種。而湖州桑樹是在優先生產葉子的選擇之後培育出來的獨物品種。官方與民間的分歧引發一些矛盾，政府最終妥協。10年後，由於財力和勞動力的短缺、局勢的變遷等原因，清政府不得不終止新疆的蠶桑發展專案。作者指出，蠶桑技術在新疆基

層社會的推廣，一方面凸顯19世紀70年代後清廷對新疆當地影響力的增強，展示專門技術和知識傳播的工具性作用；另一方面，也揭示非人類有機體是如何塑造邊疆拓殖的政治過程的。

羅繼磊在本書最後總結指出，清末危機中帝國精英對於邊疆及其自然資源的認識發生改變，由此形成一個政治邏輯，即以邊疆的自然資源來維持帝國的統治。與新疆一樣，精英也將臺灣、滿洲等地區同樣視為資源豐富的邊疆，通過建立行省、推廣教育和移民開發，這些邊疆地區最終能夠效力於維持清廷的統治。作者指出，同樣的政治邏輯在19世紀的全球性領土拓殖中都有體現，即美國西部、北非、東亞或其他地方被英、法等國視為解決內部社會矛盾的「出口」與「安全閥」。另一方面，19世紀末西北邊疆開發資源之利的過程，客觀上加強邊疆和內地的聯繫。

羅繼磊的這本著作以左宗棠的個人生命歷程為線索，將左宗棠在西北的政治故事編織在環境史與知識史的經緯之中。中國傳統的農學知識與西北邊疆知識的積累與變化構成本書的經線，全球氣候變化、市場波動以及清朝的政治和社會經濟危機是本書的緯線，呈現多種因素影響下19世紀末西北邊疆開發的多層歷程。因此，全球史的分析視角是本書的突出特點。無論是對全球棉花、罌粟、生絲價格波動影響中國地方的考察，還是對19世紀邊疆資源與國家發展之間關係的比較分析，都呈現全球史的分析視角。此外，對桑樹和蠶等非人類有機物如何塑造邊疆開發的過程進行重點闡釋，亦是本書最突出學術貢獻之一。

雖然此書各章節的組織不是那麼緊湊，文字表達也稍顯瑣碎，但是瑕不掩瑜，此書可以說是從新的角度重新闡釋19世紀末的重大歷史事件，給讀者帶來新的認識和思考，是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中值得一讀的論著。

孫博殊、張莉

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

**聶順新，《唐代佛教官寺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294頁。**

由於「歷史學家缺席」，很多中國佛教史論著無論在史料解讀、史料發掘還是史學常識方面，都存在諸多缺憾之處。對於歷史上中國佛教的發展狀